



# 明史研究论丛

第四辑



# 明史研究论丛

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明史研究论丛**

**第四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苏州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321,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

ISBN 7-80519-292-8/K·164 定价：8.00元

责任编辑 邱禹

## 目 录

- 明代地区经济研究之我见……………王毓铨(1)
- 试论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任道斌(8)
- 明代太湖流域农村专业市镇兴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张 华(30)
- 明清时期嘉兴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陈学文(48)
- 
- 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唐文基(78)
- 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樊树志(100)
- 
- 明代苏、松、常地区户籍人口消长述略……………李济贤(121)
- 
- 关于明初苏松自耕农的数量问题……………林金树(156)
- 明中叶江南经济和地主阶级各阶层……………王守稼 缪振鹏(182)
- 明代松江府加耗法之争与身份地主的发展……………廖心一(205)
- 从王祯《农书》到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表现的明代  
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李 洵(225)
- 明代无锡社会经济初探  
——读黄印《锡金识小录》……………赵永良 徐志钧(243)
- 
- 试谈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商 传(263)
- 明代的赐田与岁禄……………张海瀛(286)
- 明中后期藩王的大土地占有  
——兼论王府占有的工商业和税课……………蒋祖缘(299)

明代陕西的牧马草场与杨一清督理马政.....	郑克晟(320)
明代寺观经济初探.....	南炳文(331)
明代高利贷资本的特点及其作用.....	韩大成(348)
论明代兵变的经济原因和历史作用.....	林延清(368)
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农村手工业.....	[日]田中正俊 杨品泉译(383)
一九八三年明史研究论文目录辑要.....	(400)

# 明代地区经济研究之我见

王 毓 铨

地区经济研究,不是个新的研究课题,也不是个新的研究历史的方法。近几年,历史研究很活跃,有大量的文章、著作出版。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新创见、新贡献的论著接连出现,这是有目共睹的,可喜可贺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再向前推进一步,如何再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深入一步。

地区研究不是新方法,过去已经有人作过这样的研究工作,有的是以专题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地区研究的。如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编的《南疆农村社会》,地区是新疆南部,主题是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陈恒力所作的《补农书研究》,以嘉兴府、湖州府地区为主,主题是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力。傅衣凌所写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是以江南地区的市民经济为主题进行研究的结果。日本对中国江南地区也有不少研究,如小山正明以江南为中心的明末清初大土地所有制的研究,小畑龙雄的江南里甲制的编成和江北里甲的改编,小山正明的明代华北赋役制度的改革史的研究,川胜守的浙江嘉兴府嵌田问题——明末乡绅支配之一考察,滨岛敦俊的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宫崎市定所开始的日本关于江南地区或扬子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绅士的研究。另外,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我国学者的著作,如谭棣华关于佛山镇的研究。张仲礼的中国的绅士一书(英文),事实上也是以江南地区为主,取材也多半限于江南地区。以上只是举的几个例子,并非全部有关著作。不过这些著作虽是以江南地区为主,但研究对象多系一个专题,真正对一个地区做了比较多方面研究的,应该说是一九八二年出版的

叶显恩的《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其内容有徽州的历史地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乡绅阶层、徽州商业资本、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徽州的封建文化、徽州的佃仆制。本书还附有几份有意义的调查报告。凡是读过这本书的同志，我想会同意我的看法：叶显恩同志这本书将徽州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涉及到了，而且将这些方面的基本因素、基本矛盾所交织成的明末清初徽州社会给我们描绘出来了一个梗概。我这个估计或许不致过当。它是近年来对地区研究工作的贡献，也就是对明史研究工作的贡献。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地区研究呢？

把研究专题集中在一个地区、一定范围，第一，可以减少甚至可以排除浮泛的写作工作。这里似乎应该用“研究工作”这个词，不当用“写作工作”这个词，用“写作工作”这个词是我有所感而用的。近年来，用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很有价值的著作，但还有不少浮浮泛泛的文章，这种学术著作不能做出贡献，事实上，有若无，或者说不如干脆没有还好一些。提倡地区研究工作，把工作落实到一定地区范围内，落实到具体的重要的历史事实上，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更踏实些。

第二，可以免除乱点鸳鸯谱。今天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态度谨严的学者固然不少，也出版了不少好文章。但任意采摘文献，仞订缀合，编织成篇，这种现象还有，乍一看，挺博赅，一推敲，便发现支离破碎，不成体统。

第三，可以免除以点代面的作风。过去我们的文章中这种作风刮的相当普遍，有的作者好下总结性的结论，而又苦于史料缺乏，便不得不以点代面，强为之说。直到最近仍有这样文章。作者下了这么个结论：自宋以来，自耕农在农民阶级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大大下降，佃农所占的比例则大大上升。这是一个关系全国性的结论，证据呢？作者说：“试以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为例”。既有“经济

最发达的太湖流域”，那就应该有“最不发达的某某地区”，或“次发达的某某地区”，作者为什么以经济最发达的太湖流域为例，而不也以经济次发达或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为例呢？可能作者手头没有调查材料。如有材料，那材料也可能使其结论减色。无论如何，这种以点代面的方法，缺乏科学根据的作风，再也不应该出现了。

第四，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各有差别，华北和华南不一样，华东和华西也不尽相同，不能用一个地区的文献记载的一条或两条凑合起来，就能概括为全国的状况。如果硬加以概括，缺乏细致的分析，那论断就不会符合历史实际，也可能和历史实际相去相当远。这样的学术研究没有价值。如果我们把全国疆域大致斟酌一下，划为几个地区，个别进行研究，然后在各个地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以达到对全国情况做出若干方面的基本结论，那就大概可以达到虽不中亦不远的程度。由于各地区的基本条件不一定一样，有发达的，有不大发达的，我们还可以分析出发达与不发达的规律来，找出我们历史遗产中存在的问题。到那时，我们或者可能分析出我国历史长期停留在封建时期而前进迟缓的原因。

那么，如何进行地区研究呢？

研究地区历史的方法和研究全国历史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不一样处，只是研究的幅员有大小，个别地区有它的特殊风俗、制度等等。而分析这些特殊风俗、制度的方法，原则上也和分析一般历史生产生活、典章制度、政治斗争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给我们写下一本历史研究法，但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学到历史的研究方法。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们不是单纯的唯物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中经济是基础，但他们不是单纯的经济主义者。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信，我想大家都读过，这是马、恩二人著作中集中讲说历史研究方法的文书。恩格斯在信中主要说明了两点，第一点，“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经济状况是基础”。这是第一点，也是最基本的一点。不过，他接着说：“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为什么呢？因为，恩格斯接着说：“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另外还有“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恩格斯进一步解释说：“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简单说，照恩格斯的说法，我们要想了解历史的运动，除了基本的经济状况外，还必须考虑到许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因素。所有那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才产生了历史的运动、发展，这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上层建筑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历史发展的关系。

恩格斯又进一步更具体地解释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历史发展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以上引文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第一版第四七七至四七八页）

如果把恩格斯的话再概括一下，大概可以说有如下几点：

一、在历史的运动中，经济条件是基本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上层建筑如政治斗争、法律、哲学观点也起着作用；

三、人们创造历史是在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中有政治的条件等等，还有人们头脑中的传统；

四、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单个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如此产生出来的总结果就是历史事变。

马克思没有整段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但我记得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曾讲到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民族、宗教等等对历史运动的影响。

总之，经典作家的教导，加上我们自己大大小小的政治经验、社会经验，以及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经验，我们切不可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看得那么简单，切不可简单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是千百年来历史传统的产物，它是无数的单个意志冲突的产物。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整体，我们的头脑也应该复杂些。

而且这个复杂的整体不是死的，是活的。明朝的历史在今天死了，但我们研究它时，要把它看成是活的。换句话说，三百多年前的明代社会是个有机体，由社会的各个部分构成的活的有机体。我们研究每一部分，也就是我们选定研究的每一个课题，都是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必须纳入这个有机整体中去观察、去分析，这样才能使我们对我们所研究的个别课题达到更深刻的程度。我们可以仿照一位历史学家的一个词，叫这种方法为“横通”，和“横通”相对的是“纵通”。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通史观点：每个研究者对他所选定的研究课题，必须纳入整个历史发展中去观察，从历史事物的来龙去脉中去观察它、分析它，才能理解它的本质，才能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来。

我们把“横通”和“纵通”的观点用在一个地区的研究上，就比用在全国范围内容易点。各个地区的研究作好了，全国的情况就出来了。

如果有必要举出几个地区研究的项目来，我建议以下三项：

一、生产与再生产(农业、手工业、官手工业等等经济生产)是研究一个地区的主体。

二、研究一个地区的权力结构。主要是绅权。绅权就是本地的“官户”、乡官、乡绅、举监生员所构结、所把持的权力。研究他们的活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婚姻、门生故吏、座主弟子以及他们干涉地方政治的方法和事实。研究他们的权力斗争，以及由他们的强取豪夺所引起的阶级斗争。

三、研究一个地区的宗族、寺院、书院、族规、民间宗教、文化、政治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等等。

最后讲讲为什么今天我们先举行江南地区的研究讨论会。

理由不说也都知道，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文化方面，江南地区在明代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某些事件或某种制度的变革上说，它居有关键性的地位，或者说它是明代的先进地区。因此我们要进行地区研究，理应首先研究江南地区。

由于经济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政治上和文化上有影响的人物。它培育出了若干名进士。江南十府(除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外，加应天、绍兴、宁波三府)进士有五千二百零五人，约占全国进士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在明代，官僚集团中闹朋党，是一个很关重要的问题，而大党、重党在江南。这个地区的书院也多。书院不只是讲学的处所，也是大大小小的政治讲习所。明代几项重大制度的变化也始于江南地区。如里的编制，照人户数(一百一十户)编里改为以田土顷亩的“顺庄编里”，如一条编(鞭)法等等，这都是人人皆知的。江南的大族大姓也突出，顾、陆、朱、张等官绅地主，都子孙联绵、历时久远。北直隶八府，京师所在之地，就没有这样的现象。

这个地区有大量的文献，如文集、笔记、方志。现存明人文集可能多达二千种。现存苏、松、常、镇等十府府志三十种，七百八十

三卷，县志八十五种，一千零五十卷，乡、里、镇志八种，六十六卷。全国政治中心所在地北直隶八府，仅有府志十七种，二百六十七卷；天府之国的四川仅有府志四种，共九十一卷。相比之下，差距很远。另外，江南地区有关明代经济的政治的碑刻也很有一些。

从各个方面看，江南地区在全国各个地区中是重要的，加之遗存的文献多、碑刻多，给我们首先研究这个地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把明代江南作为我们首先进行研究的地区是合适的。

我们的明史研究者要奋发，使明史研究队伍壮大起来，成果丰富起来。

# 试论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

任道斌

唐宋时具有“武备”、“戍守”意思的“镇”，到了明代，其含意也由“分防厅汛”转而成为“人烟聚落”之所〔1〕。这些小于县而大于村的“镇”，又往往与意味着贸易的“市”连在一起，在方志中列为《市镇》一栏，成为通商贾、聚民居的象征，有时亦被称作“镇市”，或大聚落为“镇”，小聚落为“市”。所以明代的市镇，其经济功能较为显著，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它犹如社会经济肌体的脉搏，“善观国者”，可从市镇的盈缩消长“察盛衰”〔2〕。

杭嘉湖平原是明代经济发达区之一，该地东临大海，西枕苕溪，北濒太湖，南依钱江，沃野如砥，运河如带。既富湖海之利，又足桑麻之饶，成为明王朝的重要绸米、财税来源之地。因此，对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作些考察，显然对我们深入研究明代江南社会经济，认识封建经济的若干发展规律，是有典型意义的。

本文拟就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作些初步探讨。为了明瞭农业的商品化生产与工商业市镇之间的关联，文中所述并不包含府县行政权力机构所在地的城关市镇，仅以明清方志所列市镇为讨论对象。

## 一、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情况

明代杭嘉湖平原的市镇，在宋元以来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旧有市镇的恢复、兴旺；二是新兴市镇的产生、繁荣。

旧有市镇的恢复、兴旺，其较为显著者，就有如下数例：

(一)北新关市，又名青莎镇、湖墅、湖市，俗讹为湖州市，在仁和县治北十里。此地虽在南宋绍兴年间就已商贾骈集，货物辐萃，但民居不多，街廛规模仅为一“萧条”“小市”而已〔3〕。元末新开运河自此通苏州、湖州、嘉兴、镇江等处，纲运及赈米客舟皆由此进出，但镇上仍只是以夜市出名，人烟聚落，并不见繁盛。据《续建北新关题名记》，直到弘治时街衢才渐具规模。嘉靖时“市廛殷阜，肩摩踵接”〔4〕。万历初拓荆街数里，水输陆产于此集散。更有人在此筑子城包罗市河，“民居稠密，市舶楫聚”，俨然有如“都会”〔5〕。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大火，烧毁民居达四千余家〔6〕，即可见其繁盛之一斑。

(二)临平，在仁和县治东北四十里。北宋端拱元年（九八八）置镇。宋南渡以来，户口蕃息，往来辐辏，商贾十倍于昔，为首都临安北陆要津。但宋末战乱，“市井萧条”〔7〕，入元后民居渐盛。到明成化时，“海宁、仁和、上塘蚕丝”于此“贸易居多”〔8〕。演至明末，遂有地近“十里”，户近“万人”的规模〔9〕。

(三)长安，在海宁县治西北二十五里，南宋时称“长河堰”，系“鱼虾甚富”的“小市”〔10〕。元末置新堰，但占地亦不过三、四亩。尔后往来商船渐多，地益增广，明初乃于此置税课局。至嘉靖时，人烟稠密，伽蓝丛立，改称长安镇。诗人过此，有“万户千门”之喻〔11〕。

(四)濮院，又名梅泾、幽湖、濮川，在秀水县治南三十六里。北宋时此地只有一草市，周围平衍千顷，并未开植，称南北草荡。至南宋，曲阜濮云翔移居于此，草市渐兴，被理宗诏称“濮院”。元初濮鉴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称“永乐市”，四面皆市廛，“昔日聚落，遂以成镇”〔12〕。但元末遭苗兵之乱，加上洪武时濮姓奉旨他迁，宗支散逸，闾阖机杼，亦杳然散去。方孝孺过此，不禁有“十载飘零一梦中”，“濮家旧院今何在”之叹〔13〕。弘治、正德间，濮氏子

孙复聚，他姓亦卜居于此，“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巨商，负贖争委”〔14〕，濮院镇渐以恢复，得与他镇相并。万历时生齿日盛，拓街衢，广庐舍，“绵亘逾倍”，肆廛栉比，“人可万余家”〔15〕，成为嘉禾一巨镇。

(五)乌青镇，在桐乡县治北二十五里，归安县治东南九十里，为桐乡县青镇及与其夹溪相对的乌程县乌镇(又名乌墩、乌戍)之合称。北宋景德时开镇，衰于南宋德祐，再罹于元末兵火，“而民庐、寺观、书馆，举为煨尽”；间巷索然，惟有荒榛破瓦。洪武初重建，迄成化、弘治间，“居民殷富，锐于兴作，卑者高之，隘者广之；荆荒芜素无人居者，亦删刈而结构之”。民居不仅尽复，“且又过之”。嘉靖时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万历时“环居镇市，皆非一县之民”，幅员四达，百货骈集，“居民殆万家”〔16〕。

(六)双林，为东林、西林的合称，又名双溪，在归安县治东南五十四里。南宋初商人多聚于此，亦名商林。景德时开镇，至熙丰年间遂废，只是一村落，“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里中家有《户帖》者寥寥”，其时“户犹未广”。永乐三年(一四〇五)，改名双林镇，民居渐丰。成化时人口“倍于前”，“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嘉靖中，归安大姓茅坤筑别业于此，“市廛旗亭百队，环货喧阗”，日见“地隘民稠”。万历时，“氓隶杂处”，“委巷相连”。坊巷津梁周贯，遂为归安大镇。“至崇祯朝，岁征烟户册，实得户三千有奇，口万六有奇”〔17〕。

(七)新市，又名仙潭，在德清县治东北四十五里。北宋太平兴国时始见其名。南宋时有镇将屯守。元季市肆遭兵火，至明初渐有恢复。永乐时成为聚商旅、通舟楫的市镇。尔后“民居繁，市肆斗”。正德时“昔之清冷静渊”之处，被“市民所侵多矣”，居货盈肆，“米行”而外，又有“叶行”、“丝行”〔18〕。万历以来，“街衢市巷之整，人物屋居之繁，琳宫梵宇之壮，蚕丝粟米货物之盛”，可与名镇唐栖相埒〔19〕。

(八)南浔,又名南林、浔溪,在乌程县治东六十一里。宋高宗南渡过此,其地“人烟尚稀”,仅有一“荒落”“草庵”〔20〕。入元后虽然有所发展,但庐舍稀疏,居民“寥寥数家”。明初拆除张士诚所筑旧城,是时“居民不多”。直至正德,“居民尚鲜”。到了嘉、万年间,乃具规模,成为“地小人众,居民稠密,而栉比无间旷之隙”的聚落。〔21〕明末,各货类聚,客商云集,“人物日盛”,“聚且数万家”〔22〕,成为一大镇会。

至于新兴市镇的产生、繁荣,则可从下述一些例子见其大略:

(一)塘栖,又名西里、栖里。在仁和县治北五十里,水南属仁和,水北属德清。该地宋朝时犹不为人所知,仅为“一乡村耳,居人不多也”;且“水陆交阻,盗贼出没”,“僻处腹里,鲜问津者”。元末明初始成市,尔后“民居益稠密”,弘治时成为“仁和巨镇”。正统以降,为南北往来孔道,人烟以聚,风气遂开。嘉靖时“市区氓椽,鳞次栉比;比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号为“哄市”〔23〕。万历时又有“十里歌钟麇列肆”之盛〔24〕。天启间则“烟火万家,甲第连云,实大都会所不及”〔25〕。

(二)范村,在钱唐县治南三十里,滨江。万历时“客商货物多于此停居,渐成巨镇”〔26〕。

(三)袁花,又名花溪、袁化。在海宁县治东六十里。南宋时为一小盐场。元代因海运的发展,一度兴旺。明初大姓被迁配他乡,其地人烟寥落。直到嘉靖年间,才慢慢形成袁化市,不过市中小店,“止有桃、枣、空壳黄烧饼而已”,当铺亦“止有王店人郑子东一铺”。万历时“镇上一一俱全,与杭郡无异,特少烧鹅耳”,“当铺有十四五处”〔27〕。及至崇祯,镇上繁华程度仅次于硖石,成为海宁县第二大镇。

(四)新行,又名行里、新篁里,在嘉兴县治东南五十四里。元以前不著,明初以来民物滋丰,贸易辐辏。弘治时柳琰《嘉兴府志》开始纪有新行市。万历时称水陆孔道,遂“市而为镇”〔28〕,与



王店、新丰、钟带并称。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增立社学”〔29〕。明季更成为淮扬盐商建造别业的地方，具园墅亭阁之胜。

(五)新丰，又名新坊、平林、汉塘，在嘉兴县治东三十六里。宋南渡时，汴之新丰人迁此，始见地名。元时仅立巡检司，尚不称镇。成化年间，人烟繁盛。弘治时称镇，著录于《县志》。至万历，其地居民“无虑数千家”〔30〕。

(六)王店，又名梅里、梅会里，在嘉兴县治南三十六里。元代尚未称镇，“至明中叶而渐盛”。成化时居民稠密，远近商贾往来于塘桥者，“日数千人”。弘治时遂称王店镇。隆、万间市中丫髻桥两岸，楼屋栉比，极一时之盛。镇西一带，万历以前居民稀少，而万历以来人烟滋繁，“始起造市屋，或六十间，或四十二，三十二，里西渐成市镇，其名遂相沿不改”〔31〕。明季镇中“古南禅院”成为文人社会场所。“镇民之居，夹河成聚，为里者三，为梁者十”〔32〕。

(七)钟带，在嘉兴县治东五十里。元时犹不成市镇。成化时村落居人稠密。至弘治，则称为钟带市。万历时亦号“水陆之孔道，辐辏之通衢，设常平仓”，为嘉兴四镇之一〔33〕。

(八)菱湖，又名秀溪、凌波塘。在归安县东南三十六里。古未成聚，宋南渡后渐有市廛，元末毁于兵火。洪武时人居稍集，改称镇。成化、弘治年间，新丝上市，“列肆喧阗，街路拥塞”。正、嘉、隆、万时，“第宅连云，阡阍列螺，舟航集鳞”，几“无隙地，无剩水”；板桥溪港内，处处有人家。“沿湖岸铺及湖内舟船，商贾凑集。总之，各行不下百余户”。万历时“四方舟航所凑，水陆奇珍，百物所环；廛市之徒，摩肩辚毂，挥汗成雨，盖他境繁华所罕与俪”，成为归安县“雄镇”〔34〕。

从上述诸市镇的发展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各县市镇发展并不平衡，但无论是旧有市镇的恢复与兴旺，还是新兴市镇的产生与繁荣，其发展上升的曲线，大致从明代中叶，即十五世纪后期起，变得较为明显；而至嘉、隆、万时期，表现得更为迅速。这